

何日江山可定居

● 羅 崗

誠如錢鍾書所言，吳宓從來就是一位喜歡不惜筆墨、吐盡肝腸的自傳體作家^①。吳宓自己也曾稱《吳宓詩集》為「我的文學傳記」^②。當然，作為一名自傳體作家，他最重要的作品便是那長達數百萬言的《雨僧日記》。這部日記現在只不過是略有披露，就引起諸多爭議，將來若能以全部面目示人，更不知要掀起怎樣的軒然大波。正因為《雨僧日記》在吳宓著述中的核心地位，今天人們閱讀他的其他作品，往往也有意無意地與《雨僧日記》相互參證。這種「讀法」雖然略顯主觀，卻是吳宓所欣賞和期待的。對於好友吳芳吉的《碧柳日記》，他曾說^③：

此精詳之日記，實為世間之一偉著，可以表現作者特出獨具之毅力、精神、聰明、道德；可以洞見個人身心、情智、學術、志業之變遷、成長；可以曉示家庭、社會生活之因果、實況；可為二十世紀初葉中國之信史。而尤可為《碧柳詩集》之參證及註釋，凡曾讀碧柳之詩者，及知有吳芳吉之名者，均不可不細讀此日記。

這段話只需將「碧柳」和「吳芳吉」改為「雨僧」和「吳宓」，其他幾乎可以一字不易地

移用來評說《雨僧日記》，甚至用來評說吳宓所有的詩文著述，也頗為恰切。

1923年4月，正值「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即將興起之際，吳宓鑒於「本年來吾國青年思想解放，頓覺舊有全非，乍入於一種精神的無政府狀態，此非僅求智問題，乃人生觀問題」^④，特別在《學衡》上撰文〈我之人生觀〉。這篇文章針對困擾中國文人幾千年的「出處進退問題」，用「職業與志業之別」作了新的闡發^⑤：

職業者，在社會中為他人或機關而作事，藉得薪俸或佣資，以為謀生糊口之計，仰事俯畜之需，其事不必為吾之所願為，亦非即用吾之所長。然而為之者，則緣境遇之推移，機會之偶然。志業者，吾閒暇從容之時，為自己而作事，毫無報酬。其事必為吾之所極樂為，能盡用吾之所長，他人為之未必及我。而所以為此者，則由一己堅決之志願，百折不撓之熱誠毅力。縱犧牲極巨，阻難至多，仍必為之無懈。……職業與志業合一，乃人生最幸之事。然而不易數觀，所謂「達」者即此也。有志業者，其十之九，須以職業之外另求之，二者分離，所謂「窮」者即此也。

身為大學教授的吳宓使用的「職業」和「志業」的概念，很容易使人聯想起韋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慕尼黑大學所做的膾炙人口的演講《作為職業的學術》(Wissenschaft als Beruf)，這裏的「職業」一詞，韋伯原文用的是Beruf，按照《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對這個詞的解釋，這是一項以神召(Calling)為使命的「天職」，其實這已經很接近吳宓所謂「志業」的意思。然而，韋伯在演講中突出的是學術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的自主性，他要探討在整個社會的「合理化」過程中，精神的職業勞動如何成為可能。吳宓則使用了兩個極其古老的語詞「窮」和「達」來區分「職業」與「志業」的關係，儘管這兩個語詞在新的語境下已經獲得某種現代涵義，但語詞根部的意蘊並沒有那麼容易被遺忘，它們時刻都有可能喚醒人們關於「兼濟」與「獨善」的古老記憶，現代釋義與傳統內蘊在語詞間的交鋒，透露出現代知識份子職業選擇和傳統士大夫濟世情懷之間的緊張關係，極其分明地凸現出吳宓這一代知識者在激劇變動的時代所面臨的困惑與抉擇。

本世紀初隨着科學制度的廢除，「讀書」與「入仕」間的棧道徹底轟毀，傳統文人從社會權力結構中心游離出來，成為夾縫中的生存者，在向現代知識份子蛻變的過程中，上演了許多孔乙己式的生活悲劇和精神悲劇。但也恰恰因為生存於夾縫間，知識份子反而有可能質疑主流意識，關注邊緣縫隙，促成某種新的精神空間的展開。現代知識份子在文化生產領域日趨活躍，搞教育、辦出版、結社團……都與這一新空間的生成有關。吳宓關注的「職業」和「志業」的分合離散，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新式教育和出版行業的出現的確喻指着某種新的文化空間，但作為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直接成果，這些行業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商業化、科層化和職業化趨向。而脫胎於中國文人傳統的現代知識份子從來就不肯簡單地將「職業」當作「噉飯之道」，「藉得薪俸或佣資，以為謀生糊口之計，仰事俯畜之需」。由此產生了「職業與志業分離」的困境。譬如出版，一直存在着知識份子言論自由的原則與書商追逐利潤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商業性因素甚至要威脅到知識份子的自由表達。吳宓主編的《學衡》儘管一出版，「京滬諸報之侈談學術文藝者，多為文攻訐至甚」^⑥，但初期的銷量卻相當不錯，第一期雜誌隔了四年，還能印刷第三版，不難想見它受歡迎的程度。出版雜誌的中華書局自然很滿意。到了後期，由於種種原因，《學衡》的發行人逐年下跌，書局動輒以停刊相要挾，吳宓好幾次請梁啟超向中華書局總經理陸費逵說項，又將月刊改為雙月刊，延長出版周期，甚至還每期倒貼給書局一百塊錢，終究沒能避免《學衡》停刊的厄運。雜誌停刊，吳宓最感痛心的是師友的詩文，特別是舊體詩詞，「予所積盈篋，無地刊布(蓋以舊詩受眾排斥，報章雜誌皆不刊登)」，即使想編一部《近世中國詩選》，把無地刊布的詩詞集中出版，「但今各家書店，以及學校、機關，無願為予擔任印行者」^⑦。

按照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理解，現代知識份子一般具有「相對自由漂流」的特徵，他們在職業選擇、政治歸屬和思想傾向上，有着很大的自主和獨立性^⑧。的確，吳宓這一代知識份子在職業選擇上具有相當

的空間，而且他們往往將「志業」的因素放在首位加以考慮。1921年吳宓自美歸國，他之所以毅然辭去早就應允的北京高師的聘約，不顧薪金低廉（北京高師月薪300元，東南大學月薪只有160元），前往東南大學就任教職，除了好友梅光迪的殷勤相邀，他更看重東南大學是「聚集同志知友，發展理想事業之地」^⑧。三年後，由於主持大局的副校長劉伯明逝世，校內黨爭紛起，宣布裁棄西洋文學系，吳宓只能遠走東北大學，一年後又到清華大學任教。短短幾年時間，他輾轉數所大學，確實顯示出知識份子「自由漂流」的特質。然而，這種「漂流」姿態的背後是否也隱含着些許無奈呢？且不論吳宓離開東南大學完全出於形勢所迫，就是在清華大學，他擔任過國學研究院主任和外文系代理主任，親自參加學校行政管理，本以為可以將平素的教育設想付諸實施，並把志同道合的師友招致來清華。但實際的情形卻未如他所願，吳宓先是因對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發展方向，與教務長張仲述等意見不合，辭去了研究院主任之職；後來他向清華推薦過幾位教授，都被校方婉拒。可見，「職業」的自由選擇並不能保證「職業與志業的合一」，有時候，「職業」甚至會對「志業」造成傷害。

傷害「志業」的不僅是學院內部複雜的人事關係和日趨細密的學術—教育制度。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性，國家始終是社會絕大部分重要資源的控制者，大學得不到國家之外其他力量的有效支持，只能成為國家的附屬。這就使得中國的大學在國家日益嚴格的控制之下，逐漸背離了現代大學為社會服務的宗旨。大學教授在痛感教育職業化的同時，也意識到更大的威脅來自校園之外。1927年

4月，北京城謠言四起，傳說北伐軍佔領北京後，將解散清華。吳宓「決擬於政局改變、黨軍得京師、清華解散之後，宓不再為教員，亦不從事他業。而但隱居京城，以作文售稿為活，中英文並行」^⑨。他的計劃也得到了陳寅恪的贊同，「寅恪贊成宓之前議，力勸宓勿任學校教員。隱居讀書，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於學，謝絕人事，專心致志若干年。不以應酬及雜務擾其心，亂其思，費其時，則進益必多而功效殊大云」^⑩。着重號為原文所有，「教員」、「讀書」、「自活」、「於學」、「人事」等一串字眼，其實是將具體歷史情境下「職業」與「志業」間的衝突呈現出來。吳宓的態度之所以如此決絕，是因為他目睹學校內部的一系列變化，作為「寄身學校以讀書適志者」，「深感學校中之營營逐逐，不特有傷清德，抑且無補實利」^⑪。再加上時局變化，大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不僅不是安身立命之所在，甚至也不是一條好的謀身之道。吳宓「又與寅恪相約不入（國民）黨。他日黨化教育瀰漫全國，為保全個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捨棄學校，另謀生活。艱難固窮，安之而已」^⑫。

果然如他所料，1928年夏北伐軍進入北京，羅家倫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9月18日吳宓「赴大會堂羅校長宣誓就職典禮。一切如黨國新儀，演說甚多。羅氏以（一）廉潔化，（二）學術化，（三）平民化，（四）紀律化，署為標幟。又謂兼容並包，惟賢是用云云」^⑬。國民黨政府通過推行黨化教育來加強對大學的控制，大學教授則以1911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大學令》為法理依據，強調「教授治校」，保護思想自由。1929年，陳寅恪應學生劉節等人之請，撰寫《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

開頭就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不自由，毋寧死耳」是“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的譯文，這是十八世紀美國革命時期亨利 (Patrick Henry) 的名言，由此不難想見陳寅恪對思想自由的珍視。據他晚年對碑文的解釋，「『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⑮。當時吳宓雖然「去留之分，出處之際，今亦難遽定」^⑯，「不輕易與當局往還，更不干涉校事」^⑰，但他的基本立場無疑與陳寅恪相同。

20年代末的風雲變幻最終未使吳宓離開大學，困擾他的「職業」和「志業」的關係問題依然存在。困惑鬱結於心，難以排解，他甚至視「職業」為「勞役」。1930至1931年吳宓到歐洲遊學，渡假一年。剛回到清華，便大發感慨：「歐遊歸來，復就塵役，勞苦愁煩，恆讀《柏拉圖語錄》以自慰自解，且欲持此教人示世。」^⑱《柏拉圖語錄》成了他的解脫之道，吳宓著名的「二馬並馳」之喻便脫胎於柏拉圖的《斐德羅篇》(Phaedrus)。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曾用《白虎通》的「三綱六紀」來界說「中國文化」，但同時又加以申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⑲吳宓在《空軒詩話》中引述了這段話，並特別說明：「予平日所謂殉道殉情，亦即此義。」^⑳後來他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和武漢大學開設的《文學與人生》課中，便對柏拉圖思想的精義多有闡發，並力圖將它貫徹到對現實生活的理解中。僅此而言，大學也不是沒有值得留戀之處。

直到40年代末那場天翻地覆的巨變來臨之際，吳宓才下定決心離開學校。他辭去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之職，遠避西南，「目的是要在王恩洋先生主辦的東方文教學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為僧，並撰作一部描寫舊時代生活的長篇小說《新舊姻緣》以償我多年的宿願」^㉑。似乎可以兌現20年前許下的諾言，「隱居讀書，以作文售稿自活」。但吳宓沒有料想到，隨巨變接踵而來的是比任何時代都更嚴密的體制，全國人民——當然包括知識份子——都被有效地組織進國家目標之中，他只能「與時偕行，一切生活計劃都改變了」。自由選擇既不可能，消極遁世又無處可逃，命運會給他怎樣的安排呢？按照毛澤東的知識份子政策：「對知識份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㉒吳宓首先面臨的是聲勢浩大的思想改造運動，這場運動在京畿之地是由周恩來現身說法、和風細雨的報告來推動^㉓，而在西南一隅的重慶則是在鎮壓反革命的槍聲中展開的^㉔。儘管各地運動形式多種多樣，但吳宓和他舊日的同事一樣，1949年以前在大學任教的經歷受到嚴厲的詰難，這種詰難既是關於「職業」的，也是指向「志業」的，最終凝聚為一個大大的問號：為誰服務？1951年12月的《人民日報》連續刊登梁思成、羅常培的檢查文章，分別題為〈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我究竟站在甚麼立場為誰服務〉^㉕，他們的文章多在政治立場上檢討，遠不如吳宓次年發表在《新華日報》上的文章說得顯豁^㉖：

在我的職業中，我犯了純技術觀點和僱傭觀點的錯誤。我自以為我很能勤苦負責，以勞動換得薪水，而且從不

作任何政治活動，從不營商投資圖獲利潤，從未參加任何黨派，亦無宗派主義。這樣，我可算是自食其力的清高學者，不愧不忤的了。但試問：所謂國立大學是誰所立？經費何來？我究竟為誰服務？我真是「超政治」的嗎？

職業上的「僱傭」觀點，不正是他當年深致不滿的「職業」和「志業」的「分離」嗎？而「為誰服務」的問題，不也同樣關涉到他念念不忘的「職業」與「志業」的「合一」嗎？撇開特定的政治術語不論，為甚麼思想改造中的吳宓繞着圈子在說他當年說過的話？這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一種特殊的反現代的現代性理論，一方面它內在地包含了對諸如過份職業化等現代性後果的深刻反思，所謂消滅「三大差別」即是由這種反思產生的烏托邦理想；另一方面它力圖將全社會的每一個個體都納入到特定的時代和烏托邦遠景規劃之中，並藉此獲得生存和工作的意義，又體現出鮮明的現代性特徵。正是在這兩方面合力的作用下，思想改造運動似乎也像吳宓一樣在倡導「職業與志業的合一」，只不過這種「合一」是建立在「國家」、「階級」、「黨」等群體性概念之上。拋棄了「個人精神自由」的「合一」極有可能演變成一種新的強制性、壓迫性力量，極有可能對個人的「職業」選擇，特別是個人的「志業」傾向造成新的傷害。這一點已被歷史所證實。

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的出版，引發了關於晚年吳宓的激烈爭論^②。這場爭論的背後當然蘊含了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文化策略和對歷史不同的想像方式，譬如仔細地對比中心（北京、上海）和外省（四川）知識份子對這本書的不同反應，便能發現一些很

有趣的現象。即使拋開這些是非曲折，《心香淚酒祭吳宓》至少提醒我們應用更廣闊的視野，更長遠的眼光來看待晚年吳宓的命運。作為一個從中心流落到邊陲的著名知識份子，他在西南一隅28年的生活，肯定會對我們思考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反省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特別是理解中國內部的差異，提供諸多啟示。

「何處江山可定居」^③，這是1926年11月吳宓向清華推薦柳詒徵為教授，被校方拒絕，在一種「不得不為本校惜，且為世局哭也」的情緒下吟詠的詩句。這句詩和四年後陳寅恪那句著名的「最是文人不自由」^④遙相呼應，共同道破了中國知識份子在屢經顛沛的二十世紀中的可悲境遇。儘管如此，「志業」仍然是他們心靈的支柱，陳寅恪「不降志，不辱身」的「壁立千仞」的態度已為人們所熟知，就是吳宓，身處困頓之中，仍不忘朗誦王國維的《頤和園詞》和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挽詞》，「涕淚橫流，久之乃舒」^⑤。他從詩句中讀出的一定是「志業」的根柢：「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錢鍾書說他的老師吳宓「是偉人，也是傻瓜」^⑥。他大概願意別人稱他為「偉人」，卻一定不願做吳宓式的「傻瓜」。錢鍾書有一名言：「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此話按之於現實，則未免失之飄渺。1972年3月，錢鍾書夫婦能從「學部」幹校提前調回北京，全賴毛澤東詩詞英譯小組見召。1978年1月，吳宓病逝於老家陝西涇陽；這一年的9月，錢鍾書訪問意大利，在演講中直言不諱地批評陳寅恪：「解放前有位大學者在討論白居易《長恨歌》時，花費博學和細心來解答『楊貴妃入宮時是否

處女？』的問題——一個比『濟慈喝甚麼稀飯？』『普希金抽不抽煙？』等西方研究的話柄更無謂的問題。」^⑳倘若吳宓地下有知，聽了這番高論不知會作何感想。其實，歷史的幸與不幸，後人無法加以評說，只不過吳宓念茲在茲的「進退出處」問題，至今依然懸而未決。

註釋

①② 《牛津惱人園》(Norham Gardens)，6號(1937年3月)，轉引自李洪岩：〈錢鍾書與吳宓〉，《文匯報》，1997年9月23日。

③④⑤ 吳宓：〈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新華日報》，1952年7月8日。

⑥⑦⑧ 吳宓：《吳宓詩集·空軒詩話》(上海：中華書局，1935)，頁130；130；145。

⑨⑩⑪ 吳宓：〈我之人生觀〉，《學衡》，16期(1923年4月)。

⑫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136-46.

⑬ 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14。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 吳宓：《雨僧日記》，1927年3月3日；1927年6月29日；1927年10月6日；1927年6月29日；1928年9月18日；1928年6月13日；1928年10月5日；1971年1月29日。轉引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㉒ 陳寅恪：〈給科學院的答覆〉，轉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111。

㉓ 吳宓：《吳宓詩集·故都集下》，頁4。

㉔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序》，《陳寅恪詩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頁10。

㉕ 毛澤東：〈不要四面出擊〉，《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21-22。

㉖ 1951年9月29日下午，周恩來應

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及教員學習會所請，為北京、天津兩地各高等院校的教授們作了一場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整個報告談七個問題，報告人以自己為例，說明出身不好又受過舊教育的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之必要性，說明通過思想改造轉變立場和態度的意義。《周恩來文選》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只收錄了前兩個問題。

㉗ 重慶鎮壓反革命，1951年2月在重慶大學團結廣場召開高等院校的公判大會，一次就槍斃了包括重慶大學教授侯楓在內的12人，使得人心惶恐不安。當時的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區政委鄧小平特意出來安撫，他在《全黨重視做統一戰線工作》(1951年3月26日)中指出：「重慶鎮壓反革命時，有些民主人士恐慌起來，這是由於黨內同志沒有事先做好他們的工作，使得我們被動了一下。」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87。

㉘ 梁思成文章載《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7日；羅常培文章載《人民日報》，1951年12月28日。

㉙ 就我目力所及，這次爭論比較重要的文章有：季石：《〈心香淚酒祭吳宓〉質疑》，載《文匯報》，1997年5月29日；唐振常：〈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載《文匯讀書週報》，1997年6月21日；金巍：〈關於吳宓的日記〉，載《文匯讀書週報》，1997年6月28日；周錫光：〈真作假來假亦真 無為有時有還無〉，載《東方文化週刊》，1997年27期(1997年7月11日)。

㉚ 吳宓：《送柳翼謀先生南歸》，《吳宓詩集·京國集上》，頁10。

㉛ 陳寅恪：《閱報戲作二絕》，《陳寅恪詩集》，頁18。

㉜ 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明報月刊》，14卷9期(1979年9月)。

羅 崗 1967年生，現任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曾發表〈論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歷史中的《學衡》〉等論文多篇。